

# 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究\*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张秀梅

(哈尔滨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在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基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共生关系、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以及基本理论具有相融性等逻辑前提。在此基础上,还须厘清二者衔接的基本理论架构,在与中国道德对接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在与中国价值对接中进行民族性深化,在与中国精神对接中进行主体性同化,从而揭示其中运行的具体作用机制、情感机制和转化机制。这对于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2528(2019)01-0125-005

DOI:10.16580/j.sxlljydk.2019.01.036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该《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将其“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贯穿“高等教育、继续教育”<sup>[1]</sup>等各领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更体现在它的传播力上。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基于一系列的逻辑前提、理论架构、运行机制等而展开的系统工程。

## 一、传播的基本逻辑前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包括社会主要矛盾在内的诸多社会情况业已发生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担起了不同于以往的历史使命,从而也使得思想政治理

论课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跨时代的意义。具体而言,这一传播的逻辑前提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共生关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够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逻辑前提,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共生关系。斯大林曾指出,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且滋养民族文化”,而各民族文化则“充实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sup>[2](P326)</sup>这就肯定了民族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马克思主义救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就会遭到破坏甚至中断。在清末仁人志士救国无门之时,在东北三省沦陷于日本奴化教育之下,在敦煌古籍等文化遗产飘零海外之际……面临空前文化浩劫的中华文化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鉴思唐宋文化对外传播方式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17XKS008)的阶段性成果。

得到马克思主义之水而重获新生。从此，马克思主义犹如一缕春风涤荡着中华大地，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使得我们的传统文化面貌为之一新，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总之，在中国正是马克思主义挽救了处于危机中的原有文化，并且在新时代开启了其被重塑的新征程。

反过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亦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及其赋予中华民族的理解力。首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是源于中国已有的价值标准。无论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或是革命运动等，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在百余年的抗争中都彰显出了具有挽救天下苍生的情怀，都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爱国思想的践行。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救亡图存、自强保家等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根本动力的。其次，中国人民突破苏联模式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思维。无论是打破“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而转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还是突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随后各个历史时期我党化解种种新挑战和新危机，在这些重大历史进程的背后，我们都看到了中国传统精神和价值的力量，也看到了这些精神和力量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

## 2.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sup>[3](P41)</sup>这是新时代进行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列宁曾说过，发展无产阶级文化“不是臆造新的”文化，而是秉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sup>[2](P84)</sup>可见，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前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阐扬文化自信和弘扬民族精神，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关重要。

##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理论具有相融性

相融性，即两种事物可以相互融通并最终达到和谐

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够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本原因在于，二者间具有相融性。这种相融性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鉴于二者处于同一地域之中、为同一民族所需、向同一目标迈进，这种相融性不仅取决于它们在价值观、社会心理基础等方面具有很多相似性，甚至在共同的时代使命和任务等方面还具有有一致性——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个重要条件则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众所周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吸纳了周边众多文化的优长之处，从而形成了持续 5000 多年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此外，还有第三个条件，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持的开放态度。《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的责任。在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的同时，也积极倡导多方参与“推动形成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制机制”。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的普及化，恰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多种运行机制和广阔的传播渠道。由上可知，基于相似性、包容性和开放态度这三个条件，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有了可能性。

## 二、传播的理论对接与升华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向本科生共开设 5 门必修课，其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课程。新修订的 2018 年版“基础”课教材的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对应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道德，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又是当今中国社会所大力倡导的思想内容，因此是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点章节之所在。

### 1. 与中国道德对接中的创造性转化

在 2018 年版教材第五章“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部分，大量的优良传统道德被写进教材。且就该章的标题本身来讲，“明”“守”“严”，每个字就是一个词语，也具有强烈的古代汉语风格。位于该章一级条目的“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个人品德”更是大篇幅地写入了优良传统道德内容。但这里的传统道德，已经注入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基于当今社会道德建设的现实需要而做出的理论回应，反映了当今社会对优良传统道德的肯定性评价。还有许多优良传统道德未被写进教材，但也非常重要。这就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采用特定的评价标准来加以取舍，将那些契合时代需要、国家需要、民族需要的优良传统道德反映到教学实践中来。尤其要注意道德讲解中的尺度和导向，切不可将关于中华传统美德的讲解引向“儒家境界”，而应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导向，将学生引向“马克思主义境界”。

## 2. 与中国精神对接中的主体性同化

“中华文化主体性就是中华文化上的自我认同性，具有被构建特点。”<sup>[4]</sup>文化需要由主体承接，目前，传统文化创造者和主要承载者无疑是生活在古代的中国人。正是基于此，我们才提出了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抛弃传统、割断精神命脉。传统精神与当代中国精神的主体性进行对接，这一过程的彻底完成必须借助于文化从“古人”向“今人”的迁移，完成文化主体由“古”至“今”的转变。与其说这是一个迁移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古今同一、一体、同化的过程，“是一个与中国追求现代化历史实践过程相伴而生的由文化蒙昧走向文化自觉、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并在文化自觉、自信的前提下重构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过程”。<sup>[5]</sup>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这一过程显然比单纯的理论对接更为重要。

一般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较偏重道德或伦理，人们常常将道德或伦理与精神连用，甚至以道德代替精神，鲜有人关注二者之间的差别。实质上，道德与精神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德更多体现为外在的一种社会规范，而精神则更多体现在人们的内心世界。道德作为一种规范更为具体详细，时代局限性更强，而精神则更为抽象，时空跨度更广，适应性更强，影响也更为持久。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力量，不仅是指以“周公”“孔子”为代表的精神体系，而且可以追溯到更加久远的原始社会，甚至神话传说。“精卫填海”“女娲补天”“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神话传说所体现出的精神，不是一种外在的道德约束，亦不同于“孝”“悌”“仁”等道德规范。道德一旦上升为精神，便具有了崇高性，精神在人的主观体系中处于较高层次。从实现过程来看，上述道德规范需要人们加以践履，而这些古代的“中

国精神”已经内化为一种精神力量，抛却了外在的形式，达到了人与典故、人与神话、人与历史的一种精神上的高度同一，是行为主体自愿、自发、自主的高度“同一”，即精神的主体性“同化”。同时，这些中国精神又蕴藏在具体的形式中而得以展现，以此形成一种“意象”。人们通过这种“意象”来感知某种精神力量，从而在内心形成共振效应并使其得以激活，以此达到主体与外在典故的“精神同化”。这种古今主体的同一，超越了时代、超越了阶级、超越了历史，从古代的时空中穿越而来进驻到现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符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需要。

在第三章“弘扬中国精神”中的“重精神的民族传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这些内容里，集中反映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传统精神与当代精神的关系，突显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需要。传播、弘扬中国精神固然重要，但如果这个“精神”没有一个统摄者就会散而无力，甚至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产生反作用力。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深入阐明这些“精神”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意义，这样，经过主体性同化过程塑造出来的文化主体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主体。

## 3. 与中国价值对接中的民族性深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性，即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体现的民族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固有的传统价值观通过民族性而得以统一。一般而言，核心价值观是最具民族特色、最能体现民族特质的民族文化组成部分。而文化上的民族性，从该民族的演变规律来看，具有自然获得性。然而，清末民初时的中国在经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空前浩劫中，救亡图存已然成为第一需要，而封闭了上百年的中华文化，在未能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情况下，单靠自身根本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今天，在经过百年间的激荡与碰撞后，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关于我们党和国家对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已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民族性需求体现得更为充分、更为主动、也更为清晰。由此，“去民族性”开始转向“民族性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开始由“民族批判性”转向“民族主体性”“民族传承性”<sup>[7]</sup>的重塑。其具体体现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而民族性的深化作为一种高层次的传承活动，必然要围绕着该社会的核心价值进行。这种“深化”

的必要性则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主体的缺失,以及当代核心价值的传统文化底蕴的缺失。不论何种缺失,其民族性都是不完整的,而二者的古今对接恰好基于构建完整民族性的需要,通过“民族性的双向深化”从而达到同一。“民族性维度,经历了依赖—探索—自主—自觉。时代性维度,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深化改革的过程”,<sup>[8]</sup>二者的双向互动最终实现了原有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对接。总之,这是一种与时代的对接,与近代以来中国数百年革命斗争史和和平建设史中形成的价值观的对接。把传统文化作为“精神命脉”,增强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已正式写入“基础”课教材。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中不仅在内容上有传统价值观的一席之地,而且其历史底蕴更得到了新的阐发,民族性取向进一步突显。

2018年版“基础”课教材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将中国的思想道德建设置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社会主义500年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100年的革命史之中,借以引导当代青年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使思想道德建设更富于使命感、接续感、时代感。这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不仅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多元价值观的凝练和升华,一旦放入历史长河中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它便具有了更大的凝聚力,成为汇聚古今价值观的“凝结核”,并最终融合成为一个体系。

概言之,该门课程与传统文化的对接点可归纳为“三板块”(即前已述及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道德)“三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和“三传统”。“三传统”,即爱国主义传统、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革命道德传统。由此可见,无论从教材结构本身,还是从教学过程间接涉及的传统内容来看,这门课程较为适合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教育。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上按传播的相关程度可分为强相关、中相关、弱相关三类。强相关,即教材中存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理论共同点且相对较为系统的内容,该部分内容可直接依据教材中的传统文化理论进行讲解和传播。中相关,即教材中有关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只涉及几句话甚至仅仅是一些关键词,这种情况就需要扩展教材外的传统文化内容。低相关,属于隐性的传播方式,亦即教材中没有直接对应的内容,而是属于同一论题下的不同理论,这种情况下可采用间接传播方式。譬如,

从传统文化角度诠释理论、溯源历史、运用教育方法等均属于间接嵌入式传播。在诠释理论的过程中,要优先选用中国方法和理论进行诠释。在历史溯源中,面对中西文化两条思考路径时,中华文化路径应予以优先考虑,以培养“中国优先”的“集体有意识”,<sup>[9](P525)</sup>从而逐渐扭转部分探索问题倾向西方的思维方式。

### 三、传播的运行机制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遵循课程的基本教育规律,需要我们在依托原有课程教育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传播的作用机制、情感机制、转化机制等运行机制,为促进传播活动由理论向实践飞跃架设桥梁,从而推动传播活动向系统性、高水平方向深化。

#### 1. 传播的作用机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通过多个传播的作用机制互融互通、共同发展。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传播”“三对接”。所谓“三传播”,即背景传播、案例传播和情境传播。毋庸置疑,每个理论问题都有其产生的根源,而在涉及某一问题的历史背景时可适度融入与此相关的传统文化,即背景传播。譬如在列举案例论证理论时,可选择传统文化中的名人事迹、英雄壮举等达到传播目的。此外,还可以从传统文化角度布置教学情境,依托多媒体、微课、网络平台等进行传统的音乐渲染、绘画熏染、书法浸染等,即情境传播。所谓“三对接”,即理论对接性传播、思维方法对接性传播、工具对接性传播。理论对接性传播就是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运用到课程的相关理论阐述中进行传播;思维方法对接性传播是将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方法等在课程中彰显出来进行传播;工具对接性传播是将传统语言文字、音韵声律等作为基本工具运用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来。此外,语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作用机制。汉语之所以成为文化的重要内容,不仅仅源于其文字传承,也在于汉字中形成的一些带有文化故事、文化标签性质的文化元素。汉语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包括成语、典故、寓言、歇后语、方言等,运用这些文化元素表述情感或论证理论即意味着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比那些缺少文化底蕴的语言更具感染力。

#### 2. 传播的情感机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可借助于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情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运行的情感机制。这一过程应遵循一定的原则,除了坚持传播“需要理性批判”<sup>[10]</sup>“主次分明”<sup>[11]</sup>等原则外,在情感教育方面还应遵循“近、奇、罕、卓、美”五原则。选取贴近学生的事例追溯其历史由来,会大大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可度。“近、奇、罕”并非无所规制,而是要受到教育规律的制约。美国心理学家霍金斯在《意念力》一书中提出,经过实验多次证明,客观正确的陈述能够激发被试者肌肉正面的反应,相反“就会产生负面的反应”,<sup>[12](P8)</sup>实验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既然积极的正能量刺激会让人变得有力量,那么“近、奇、罕”就应该尽可能具有正向性,在教学中选择卓越人物特别是极富感染力的正面人物,同时选择较好的教学素材传播真善美和正能量,均有助于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 3. 传播的转化机制

从教师的教育教学角度来讲,传播过程的有效实现须历经一系列转化过程,概括起来即“知、接、融、传、爱、行”。首先要求“知”,不仅要从整体上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要熟悉和掌握所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更要明确当代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现实诉求,寻找衔接点,然后才能“无缝对接”地有效传播,最终相得益彰。随后将对接了的古今文化融为一体(即所谓“融”),并加以深刻理解和分析,形成新的教学内容和理论架构,传播给处于传统文化理论认知阶段的学生(即所谓“传”)。然后,运用东方特有的情感机制来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即所谓“爱”),譬如中华孝道等。最后,再通过一系列实践教学活,如书法、国画、围棋等文化体验课来加以强化,提升传播的效果(即所谓“行”)。以上几个方面之间的有机衔接共同构成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机制。当然,实践不止,理论也在不断前行,思想政治理论课自身运行机制还有很多需要深入研究之处,优秀传统文化在课程中的传播机制还有很多需要探索和完善的,需要我们“思政人”为之不懈努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不仅要关注其理论的阐述,更应注重十九大精神的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关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与传播的重要论述,这已经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得到了切实的体

现。在中华文化传播中,“思政人”要勇于担当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中国道德对接中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与中国价值对接中进行的民族性深化,与中国精神对接中进行的主体性同化等使命,不断深入探究其中的运行机制,阐述其中的基本规律。惟其如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才能取得更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培养出更多能够承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重任的时代新人,进而才能助力于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2017-01-25/2017-12-16.
- [2]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论科学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 封德平.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建设[J].齐鲁学刊,2015,(6).
- [5] 林默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与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2).
- [6] 王丽荣,蔡开贤.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性[J].湖北社会科学,2017,(11).
- [7] 张学昌.主体自觉与传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J].世界民族,2017,(2).
- [8] 黄斐.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话语建构视阈下中国共产党的话语逻辑[J].理论月刊,2017,(11).
- [9] 乔清举.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10] 付秀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路径探析[J].教育与职业,2015,(2).
- [11] 张瑞涛.论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融通[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7).
- [12] [美]霍金斯.意念力[M].李楠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鲍莉炜